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NEWSLETTER

5
GDN

真實烏托邦

Erik Olin Wright

發展做為正義

Kalpana Kannabiran

面對水資源不平等

José Esteban Castro

- > 全球勞動的辯論
- > 紀念Robert Merton
- > Catalonia的年輕社會學家
- > 動社會學在中東
- > 歷史一隅：ISA制度的演變
- > 西班牙革命中的社會學
- > 給主編的信：滾牛糞
- > 編輯介紹：Paulista編輯團隊
- > 人權：英國的反恐案例

第一卷 / 第五期 / 2011.7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主編的話

與命定論和本質論不同，社會學認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所以我們在第5期的全球對話中以「真實烏托邦」的討論起頭。這個概念是Erik Wright所發展出來的，用來指涉那些實存、挑戰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其他的文章也圍繞這個主題：Kalpana Kannabiran以印度的個案去討論發展與正義；Teresa Sordé和Tatiana Santos則描述西班牙參與式民主的嘗試；José Esteban Castro則探討拉丁美洲的水資源正義。其他傑出的勞動社會學者從不同的方向來處理「真實烏托邦」的概念，同時也藉著探討「反霸權的全球化」概念，延續了我們一直在進行中的「全球社會學」辯論。因此，Edward Webster討論了南非的全球勞工運動，潘毅和Enrique de la Garza則是分別討論了中國和墨西哥的例子。Farid Alatas報導了在Tehran的中東社會學會議，Ana Vidu則是介紹在Barcelona舉行的青年社會學者會議。此外，Nadia Asheulova和Jaime Jiménez則提及了RC23對科學社會學大師Robert Merton的紀念會。其他的特別專欄還包括了：假借反恐之名對學術自由進行迫害的事件，ISA雙委員會制度的歷史，以及非洲的滾牛糞抽樣。最後，我們還開啓了一個新的專欄：介紹我們世界各地的編輯團隊。在此也誠摯歡迎來自Tehran的年輕社會學家編輯群，他們負責波斯文版本的全球對話，這是我們的第10個語言！

在Facebook和ISA的網站上可以找到全球對話。

ISA website

facebook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真實烏托邦與全球社會學	3
發展做為正義：印度的真實烏托邦	5
面對拉丁美洲的水資源不平等	8

> 全球勞動的辯論

南非觀點	13
中國觀點	15
墨西哥觀點	17

> 會議

動社會學在中東	7
Catalonia的年輕社會學家	10
紀念Robert Merton	20

> 特集

歷史一隅：ISA制度的演變	7
西班牙革命中的社會學	11
給主編的信：滾牛糞	18
編輯介紹：Paulista編輯團隊	19
人權：英國的反恐案例	21

> 編輯委員

主編：Michael Burawoy

執行編輯：Lola Busuttil、August Bagà、Genevieve Head-Gordon

副主編：Margaret Abraham、Tina Uys、Raquel Sosa、Jennifer Platt、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Izabela Barlinska、Louis Chauvel、Dilek Cindoglu、Tom Dwyer、Jan Fritz、Sari Hanafi、Jaime Jimenez、Habibul Khondker、Simon Mapadimeng、Ishwar Modi、Nikita Pokrovsky、Emma Porio、佐藤嘉倫、Vineeta Sinha、Benjamin Tejerina、伊慶春、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Sari Hanafi、Mounir Saidani

巴西：Gustavo Taniguti、Juliana Tonche、Pedro Mancini、Fabio Silva Tsunoda、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Andreza Galli、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印度：Ishwar Modi、Rajeev Gupta、Rashmi Jain、Uday Singh

日本：芝真里、塩谷芳也、姫野宏輔、高見具広、速水奈名子、岩館豊、池田和弘

西班牙：Gisela Redondo

台灣：何經懋

伊朗：Reyhaneh Javadi、Saghar Bozorgi、Mitra Daneshvar、Shahrad Shahvand

以告訴我們如何邁向另外一個世界的社會轉型理論。對於真實烏托邦的研究則是滿足上述第二點的方法之一。

真實烏托邦中所指的「烏托邦」，意味著針對現今主宰著我們內心對於人類公平世界想像的社會制度，提出其他可能的選項。這基本上是個道德議題：去思考什麼判別制度是否符合正義的道德判準，以及替代性制度的安排是否符合這些價值。而所謂的「真實」，意味著去探討支配性制度的替代選項，且聚焦在非預期性後果和自我毀滅的問題上。我們很清楚我們要的是什麼：嚴謹且可行的替代模式，嚴肅處理實際的制度設計問題，以及留意實踐理想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研究真實烏托邦隱含著發展一種「可能性」、而不單單只是「現實性」的社會學。然而，我們要怎麼避免只是不切實際地唱高調呢？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去辨識出那些實存的社會制度，指出它們是如何和既有的支配邏輯背道而馳、並體現了解放和揭示了實現烏托邦的無限可能。因此，這裡的研究重點在於檢視這些個案如何成功，如何促進了人類的福祉；另外，也要去分析其限制、困難、以及未預期的後果，並且去瞭解進一步的發展潛力和可能推展的方式。這樣的研究有可能是種引誘，讓人毫不批判地就為大有前途的試驗計畫歡呼喝采；也可能導致危險，讓人變得犬儒，總是把缺陷視為真實、把潛力當成幻覺。

但是，對那些富有啟發性之經驗個案的研究只是真實烏托邦計畫的一部份。過度集中在經驗案例上，會窄化了替代可能性的意義，限縮到特定、微觀的社會組織制度上。我們仍然要理解在巨觀層次上、整體社

>>



> 真實烏托邦與全球社會學

by Erik Olin Wrigh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Erik Wright是美國社會學會的候任理事長，其任內的主軸將會是「想像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這也正是他一系列新書的書名。我派了一個任務給他：在1500字內解釋何謂真實烏托邦，以及和全球社會學的關係。大家覺得他有達成任務嗎？

「真實烏托邦」這個概念來自於批判社會學的基礎宣稱：在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裡，人類歷經了各種形式的苦難，繁榮景象的背後也有許多缺陷，這一切都是由於我們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所導致。貧窮

不是本質，而是現實社會組織權力不平等安排的後果。這樣的宣稱為批判社會學提供了三個核心任務：第一，對這些問題的社會根源進行診斷；第二，去設計、連結替代性的制度與結構；第三，發展那些可

會系統運行的意義下，「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句話所代表的真正含意。之前這樣的討論總是圍繞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時代性的對立概念上。而探討這種系統層次的替代性選項需要更多針對各種不同社會與經濟結構模式的抽象理論分析。一個完整的真實烏托邦社會學必須整合具體的經驗研究，提供想像解放的可能，以及抽象的理論探討，讓我們認識替代系統的運作邏輯。

在這篇短短的文章中我很難用隻字片語去完整道盡這項計畫。我們能作的，是去豐富這個構想的內涵。以下將藉著檢視兩個經驗個案來進行。這兩個案例(若仍然不是很完整)體現了一種基進、平等的民主制度。第一個例子來自全球南方，第二個來自於全球北方。

> 都市參與式預算

直接民主的概念意味著讓公民直接參與政策制訂。這種想法而在當代社會中被認為是天方夜譚。因此，參與式預算的構想就無疑地是一種尖銳的挑戰性嘗試。故事是這樣子的：1989年，在巴西的Porto Alegre，參與式預算意外地被發明了。在1988年末，歷經了漫長的軍事獨裁，總算轉型到民主政治之際，左翼的政黨雖然贏得了市長選舉，不過，議會席次未過半數，所以面臨到了未來4年將無法推行任何進步改革的窘境。

在這樣的情況下，左翼政黨問了一個經典的問題：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en)?他們提出的對策，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參與式預算。這是一種由一般市民來參與的預算制訂模式，採用不同於傳統由上而下的方式，將Porto Alegre劃分成數個區域，每一區都設置有預算參與委員會。此外，還有數

個全市規模的預算委員會，涵蓋各種主題，像是文化、公共運輸等。每一個議會的的工作就是去制訂出具體的預算計畫，特別是基礎建設方面的。每一位市民都可以參與制訂過程和投票，並在正式批准這些區域和主題預算後，每個區域委員會選出一位代表參加全市規模的預算委員會，為期可能長達數個月之久，直到所有代表一致通過全市的預算計畫。

從1990年早期開始，參與式預算就在Porto Alegre順利運作了。其中幾年預算制訂的過程相當活躍，有上千人參加了全市的預算審議；然而，除此之外，特別是政府經常支出的額度有限時，參與的人數就減少了。但無論如何參與式預算還是激起了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並將全市的預算支出花費在貧窮和弱勢族群上，而非菁英階級。總體來說，這項計畫已經為民主深化開啓了嶄新的可能。

在Porto Alegre開始實施參與式預算的那幾年，世界各地有超過1000個的城市在試驗類似的計畫。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用來說明真實烏托邦的創新構想如何從全球南方拓展到北方。

> Wikipedia

請大家想像一下：在2000年，Wikipedia尚未被發明的年代，某個人提出要在10年內完成一個有350萬個英文條目的百科全書，而目標是日後要成為當數百萬人想要查詢某個基本資訊時第一個會去的網站。然後，我們假設這個人提出了生產和使用百科全書的制度：(1)條目由全世界數十萬人無償地寫作；(2)任何人都可以編輯修改任何的條目；(3)這個百科的使用毫無任何身份限制。這簡直就是是不可能的任務！試想，數

十萬計的人一起合作編寫一項高品質的條目，不拿任何薪水，使用不需付費，這徹底違背經濟理論所說的任何合作都必須有金錢誘因才能達到最有效率的資源運用。Wikipedia是一個絕佳的平等主義、反資本主義的知識生產與分享的例子。它以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為基礎，以水平互惠、而非垂直控制的邏輯組織而成。並且不到10年內，就把源自於18世紀百科全書的商品市場給擊垮了。

Wikipedia是我們最為熟悉的一種非資本主義、非市場生產制度的例子。其在這個數位時代浮現：點對點、合作、非商品化的生產。這種新型態的生產模式，和其他數種資訊經濟的真實烏托邦有著密切的關連，像是創用計畫(creative commons)、公共版權(copyleft)、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 software)。我們將可以看到的是這樣的形式如何對資本主義的智慧財產權概念帶來衝擊，或是在這資本主義體支配制中創造出更多元的經濟形式。

以上兩個例子闡釋了社會替代選項的概念，以及如何不同於當代的權力結構與不平等組織。這些例子都為我們社會更平等與民主的想像提供了嶄新的思考，也反映出了追尋人類社會福祉的烏托邦渴望。不過，我們仍然在找尋實現這個渴望的具體方法。總之，瞭解世界上存在著諸多的可能性，正是真實烏托邦計畫的核心要旨。

> 發展做為正義： 印度的真實烏托邦

by Kalpana Kannabiran, Counci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Hyderabad, ISA 計畫委員



Adivasis 的群眾運動

在地度，種種有關發展的論述，內部歧異性都很大，大到如同我們的生物多樣性一般（雖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如此的精力旺盛）。我不打算按照這個論述的邏輯，而採用從我和Adivasi這個社區一起工作的經驗、一同參與憲法和法律制訂的經驗中所得到的靈感開始。

首先，我們有很多種「發展」的方式。這個概念最具支配性的詞彙，是「大水庫」、「生態惡化」、「綠色革命」、「經濟成長」、「採礦」、「軍事佔領」、「原住民知識的盜用」、「自由貿易」、「全球化」等。某種程度上，「發展」的實踐和反抗被其巨大的力量所掩蓋。這些實踐和反抗，是一種「另類發展」，像是永續經營、環境保護、生態系統和傳統知識系統的培育等等。這裡等一下所提到的例子雖然規模不大，但是都是在印度具有決定性的一種努力，努力為了生存、發聲、被看見，以及努力對抗POSCO、Vedanta、Narmada、Pola-

varam、Chhattisgarh和Manipur等。

若用這個另類發展當作討論的起點，我們會發現：多元主義是討論的核心概念。仔細檢視這些為了生存和尊嚴的奮鬥過程，就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正義很難實現。然而，把發展視為一種自由的形式，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要謹慎地去對應到各種發展可能的方式（請參見Martha Nussbaum和Amartya Sen豐富的討論）。此外，也必須以其歷史與社會的特性去重新檢視對自由造成的威脅。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瞭解社會秩序如何為開發、未開發、不自由帶來危害（請回想一下那些古老的辯論）。

在Adivasi社區中，有超過500個部落被印度憲法的第342 條文所認可，這個區域橫跨了除了Punjab、Haryana、Delhi、Pondicherry和Chandigarh的全印度。印度的中部和東北部擁有最集中的Adivasi社區，人口超過了North East、Lak-

>>

shadweep、Dadra、Nagar Haveli的50%。其中約有75個部落被官方稱為原始部落(Primitive Tribal Groups)，很顯然這是依照居住地、經濟、人口規模而定，也充滿了刻板印象。

反歧視和爭取自由權利的運動在Adivasi有很大的迴響。游牧和半游牧的部落在狩獵、採集食物、耕作等方面與要有移動的自由。被印度憲法的Schedules V和VI所認定的部落也需要擁有在這個區域中免於被驅逐之恐懼與權利。這些人若居住在其他地方，就沒有上述憲法權利的保證，即使這種情況可能已經傳遞數代了，情況仍然如此。

在這些案例中，自由權以領土權來定義，也就是其居住的土地是固定或是移動的，但也授與人民對其的特殊認同，讓不同的生活模式成為可能。不論在農民或是非農民社區，與土地的關係已經成為了Adivasi和法律與憲法的抗爭的核心。所以幾個主要的勝利都是在法庭內爭取而來的。

因為大部分的Adivasi社群都住在森林中，所以居住的議題不僅僅侷限在土地上，也延伸到整個森林的範圍。此外，此一社群的主要關懷也不只是生計或是居住而已，也拓展到生態、環境、保育、知識系統的革新等等，也就是森林的所有政治經濟學面象。由於他們的生活和森林密切相關，所以也當然是野生動物保護和森林保育的重要團體。

在森林中的位置導致了對於統治、自主、自治、森林權等相關的抗爭，對抗新自由主義發展國家所定義的主權概念。然而，這是不折不扣的自主性防衛，用Adivasi的話來說，就是「maava naate maava raaj」（吾之土地，吾之規則），也在印度憲法的Schedules V和VI中被載明，特別指出了保護Adivasi的土地，提供語言、工具、策略去對抗那無情、霸權、暴力的國家主權，防止其任何限縮憲法權利的企圖。

Adivasi也漸漸發現他們總是與最高法院的強力遊說在對抗，這對他們來說，無論在物理或是社會空間的距離上都有著很難被超越的障礙。然而，雖然大眾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就是他們很天真，不爭世事，但是他們已經堅決地宣稱他們應該享有的權力，而且這樣的權利是世代相傳下來的。

Panchayats Extension to the Scheduled Areas Act of 1996 (PESA) 和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Traditional Forest Dwellers (Recognition of Forest Rights) Act of 2006 (FRA)兩個法案，是設計用

來管理和統治政治經濟的。而這也變成是Adivasi在抗爭和審議時的魔法仗。重要的是，這些法案的辯論，代表的是一種普遍、甚至是轉型中的憲政主義的實踐。

對Adivasi社群來說，要享受到印度憲法保障下的反歧視權利，此權利必須轉譯成從內部殖民而來的自由。此一權利是在1950年憲法生效後被確立下來的。也因此很適合放在PESA和FRA的憲政道德架構下去看待。對於Ambedkar這樣一個人民和憲政權利最主要的防衛者來說，和平的民主憲政工作是需要一個管理的模式，適合於且相當於憲法架構。

現在我們可以重述我們的問題：歧視如何以正義之名把某些群體排除在發展之外？這牽涉到歧視多個層級的脈絡，各種壓迫交錯複雜的多元特性，在建構發展的概念時，必須好好的思考該如何處理。假設歧視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針對性，以及自我持續的傾向，發展的這個概念雖然在過去多數時候是反憲政主義的，但是現在不應該維持這個方向，反而要加入且產生自己的工具。雖然正義會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呈現在人們面前，但是以憲政主義去推動發展和正義的緊密關連，是很有用的。憲政主義的那一個面象和是和發展作為正義的這個概念密不可分的？若我們同意：沒有偏見的多元主義和多樣性是追求理想與正義社會的驅動力，而且對於發展這個概念來說很重要，那麼，憲法會怎麼對這樣的斷言表示意見呢？

此一憲法的方式將發展視為是一種有限的努力，在這之中，正義和自由在空間和社會上被限制在民主國家裡，而這個國家有責任去保護人民免於遭受侵害、分配資源和實現個人能力。而這些並非一個政府與生俱來，心甘情願要負的責任，而是一個國家沒有理由拒絕的責任，特別是當政府遭受到來自於公民自由和Adivasi權利運動的壓力時，更該如此。 ■

> 歷史一隅

國家學會和 研究委員會

by Jennifer Platt，出版副會長

國家學會是ISA的集體會員，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亦是，兩者都扮演著不可獲缺的角色。但是他們的功能至今已經有所改變。當ISA在1949年成立時，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底下，採用聯合國的會員國架構。那時很少國家有社會學會，不過，此一景象很快就改變了。到1959年為止，已經有35個學會加入ISA。ISA的管理委員會(Governing Council)有納入各國學會會員的代表權，並且從中選出組成執行委員會(EC)。當時的執行委員會下設置有一個次級研究會員會(Research Subcommittee, RC)，去決定與社會階層化或社會流動相關議題的工作執行。而到了1950年代末，RC的議題擴展到其他許多領域，例如家庭等，成立了許多次級的小型工作小組，並採邀請會員制，每個國家不超過2個會員。

研究委員會向來被認為是積極的國際主義者，因此也較廣為人知。1970年ISA展開了重要的組織變革，將RC開放了，引進了個人會員，而且RC的成員不再只是來自於管理委員會。後來Research Council成立了，並且有4個EC的會員加入11個國家會員代表。開放後的RC組織變得更加龐大，加上有些會員淡出了原本的領域，因此聯合的RC(joint RC)就變得比較不那麼重要。總之，各個RC漸漸地在管理層級上越來越重要，到了1994年，現行的組織架構正式確立了，國家學會和RC的規模都到了符合了議會(Council)的標準，可以投票選舉EC半數的會員。

當時的RC可以選出研究副會長，但是這也讓國家學會會員產生了些許的不滿。所以2002年設置了國家學會副會長一職，第一任的副會長是Sujata Patel。這個新制度讓國家學會更加活躍。迄今兩屆的副會長發展出了一套以滿足在委員會和世界大會間需求的會議模式，這讓ISA的事務更有效率、參與更加廣泛，也讓ISA的治理架構與知識的模式產生關連，最近幾年的集體發表就是這種雙元結構的最佳例證。 ■

> 紀念 Robert K. Merton

by Nadia Asheulova, Center for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Science Studies, St Petersburg Branch,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RC23成員、Jaime Jiménez,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執行委員

2010年7月是Robert Merton的100歲冥誕。他是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我們紀念他，除了是因他的誕辰之外，也由於他對於開啓了科學社會學的這個次領域，功不可沒。1966年Merton和Joseph Ben-David一同贊助了ISA的RC23之成立。RC23的領域



Robert Merton,
1910-2003.

正是科學(與科技)社會學，而Merton也成為1974年的會長。他在1970-71年也是執行委員。Merton教授於1910年在費城出生，父母是烏克蘭移民。其名字總是和許多社會的領域連結在一起，特別是他幾乎就是科學社會學的同義詞。所謂的「Merton式的科學社會學」廣泛地被科學社群所接受。他也是第一位得到美國科學的最高榮譽—國家科學獎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的第一位社會學家(1994)。他專注在「中程理論」，而非大理論或是抽象經驗主義，從日常生活中去建立概念。他和同事發明了「自我實現預言」、「角色模式」、「焦點訪問」(後來被誤用成「焦點團體」)等概念。1942年他專注在發展「科學之精神特質」(ethos of science)的研究上，以及這些價值如何影響了制度內的科學行為。此外，Merton的研究早已超出學院之外，包括影響了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其發明的概念：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指的是富者越富、窮者越窮，也廣為人知。這個源自於聖經的詞，原本是在闡述科學中的一種現象：那些原本就擁有權力、經濟或社會資本的人，會累積更多這些資本或權力。Merton的100歲紀念論文集由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St Petersburg Branch和RC23共同出版。



2003年世界社會論壇反對水資源的私有化

> 面對水資源的不正義

by José Esteban Castro, Newcastle University (UK), ISA 計畫委員

1 980年聯合國的Water Decade設立了一個目標，就是在1990年之前要每天提供40公升乾淨的可飲用水給地球上的每一個人。很顯然這個目標沒有達成。1990年，世界上約有17%的人擁有甚至不到1公升的乾淨水源，同時也有40%的人沒辦法使用最基本的下水道設施。然後，聯合國在2000年採用了Millennium De-

velopment Goals (MDGs)。和Water Decade比起來，這項計畫就小氣得多，甚至倒退，這或許是在1990年之後自由市場的保守主義開始佔據支配地位有關。

MDGs對於水和下水道設施的構想，是要在2015年將那些沒辦法享用此資源的人口減少一半。雖然有些學者聲稱這一新目標更加務實，但

是實際上卻是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將有數以百萬記的人類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因為缺少乾淨水資源而死亡。事實上，聯合國監督這項計畫的報告中指出，未來的情況將持續惡化。雖然許多國家達到了乾淨水資源的標準，但是可能在下水道設施的部分就無法滿足。更有甚者，我們可能未來達到MDGs的目標而犧牲了環境，因為更多

>>

的乾淨水必須用以滿足目標，水流量會明顯增加。若我們考慮全球南方只有5%的廢水在排出之前有處理過，在考量環境成本下，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到爲了滿足MDGs不僅僅需要大量經濟和財務上的努力，也有著相當棘手和長遠的倫理與政治問題。

➤ 社會鬥爭和公共財的商品化

關於這個議題，一個國際性的困境是：有人提議將每日最低乾淨用水量設爲人權，可是遭到許多國家的反對，特別是那些全球北方的國家。雖然在2010聯合國最終還是通過了這項人權提案(由於許多反對者棄權投票)。這也和1980年代主流公共政策在推動一種概念，就是解決供水危機是私有化和商品化核心，這要揚棄最低供水量等公共財的理念。雖然最直接的水的私有化政策打敗了許多國家，但是商品化的過程是無情的，且和公有、私有、或是公民社會對於水資源服務的提供者之認同是獨立的。公營事業必須像個私人企業一樣，將經濟效率(利潤)置於社會效率(如毫無差別地提供水資源給每個人)之上。再者，許多公共操作者必須進入到公—私的伙伴關係之中，通常不過就是不同名稱的私有化，目的是爲了得到投資資金。這種問題，包括了貪污、無效率、無責任等的公營事業缺點，以及不僅是在貧窮國家，持續是社會與政治對立的根源。

對基本水資源的取用是文明生活的基本面象，但是大多數的人卻被排除在外。我們上述所提到問題不過是結構性不平等與不正義的冰山一角，點出了人類與水資源，特別是自然環境的關係。在不移除水資源的課題爲前提之下，我們還是要用許多篇幅描述一下現今狀況基本樣貌。然而有許多特別的議題值得提出討論，包括了不受控制的露天採礦，這從1990年就延伸擴展到那些非傳統礦區的國度，像是拉丁美洲。現在，從墨西哥到巴塔哥尼亞的露天採礦破壞了冰河、森林，污染的水和土壤，有氰化物和汞等有毒物質，毒害了與多人。這樣持續性的社會抗爭的根源包括了：持續的破壞森林會對水的地理系統產生嚴重的後果，也會影響人類社群和全球氣候變遷。大量水資源的基礎建設包括了水壩、河流改道、水道等。對水資源生態系統的破壞，像是紅樹林，濕地等，則爲商業活動拓展了不小的空間。

➤ 面對水資源分配的不公不義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強調科學知識的轉型潛力，此一過程有兩方面的性格：他們值得成爲研究的知識對象，但是這樣的知識也相當實際、物質、而且是基礎的政治後果，不論被承認與否都是如此。這是一個現在內部、以及跨學科領域去研究在拉美和迦勒比海水資源不平等和不正義的基本前提，有個研究的網絡WATERLAT (www.waterlat.org)，此一研究的方法可以用3個假設來解釋：

(1)關於水的治理和管理有其資本主義性格。事實上，和水的治理和管理有關之日益增加的結構是由資本積累所驅動。有些考量，像是處理環境無法永續、不平等、不正義等的需求，其動力都是來自於資本積累。

(2)與水資源關係的無防備性的社會生成。我們治理和管理水資源的方式，給人類帶來很大的危險與危害。這些危險和危害來自於幾個原因：無法取得乾淨用水、基礎的供水設施遭受到許多由人類所造成的災害(如洪水、乾旱、各式污染)的破壞。儘管科技日益複雜，但是這樣的危險和危害仍是當今人類文明的最大威脅。WATERLAT的重點不僅僅是對人類脆弱性的研究，更是強調人類無防禦能力的社會生成，以及如何影響到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口。

(3)透過對水資源運用、管理、控制，以及對水之相關知識的生產、使用的民主化，以此方式來解決無防備能力的問題。WATERLAT採用跨學科的方法，將學術和社會運動結合，去民主化水資源相關的活動。這裡的行動者包括了政策的制訂與執行者、水資源管理者、社會欲動、工會、環境組織、原住民社群等等。

WATERLAT在2010於巴西São Paulo舉行了爲期3天的國際型會議，主題是「社會與環境正義的緊張關係：以水的管理爲例」。這場會議來自世界各地，例如阿根廷、玻利維亞、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厄瓜多、海地、義大利、墨

>>>

西哥、尼加拉瓜、秘魯、西班牙、瑞典、英國、烏拉圭、委內瑞拉等國，共300多人參與。並且有出版電子書，超過100篇論文(多數是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提供下載(<http://www.waterlat.org/publications.html>)，以及DVD記錄會議活動，包括主題演講和對參與這的訪問，若有需要可以去信索取(e-mail: waterlat@ncl.ac.uk)。

下一屆年會將會於2011年10月24-26日在墨西哥舉行，由拉丁美洲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主辦(FLACSO Mexico)，其也是這個組織的伙伴之一。今年的主題，第一天將會是「水的不平等、不正義、無防禦性」；第二天則是「水與公眾健康的不平等、不正義、無防禦性」；第3天將會聚焦在「面對水的不平等、不平等、無防禦性：X學科的挑戰」。更多的資訊請見：<http://www.waterlat.org/AcademicEvents.html>

註：易受傷性(vulnerability)指的是容易遭受攻擊而受傷；脆弱性(fragility)是一種容易被破壞的狀態；而無防禦性(defencelessness)包括了問題的社會面象，意味著人類有一種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特性，意即被迫繳械。

> 青年社會學家，年輕的觀點

by Ana Vidu,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 Catalonia的青年社會學家

「我們在社會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我們300位年輕的社會學家站在這裡，對於這個學科的未來發展相當關鍵。」Junior Sociology Association的會長——一位研究生、年輕的研究者——為第4屆Catalan Congress of Young Sociologists揭開序幕，會議於2011年4月29-30日在Barcelona舉行。第一次參加的學生(學士、碩士、博士)來自Madrid、Granada、Malaga、Valencia、Catalonia等地。約90篇論文，主題涵蓋了認同、種族主義、失業、民主、性、生態等，向

同儕及教授報告。會議由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潘毅教授的演講開始，她描述了年輕的中國社會學家投身到勞動剝削的研究和批判。當她提到社會學可以為更民主的社會貢獻其力時，觀眾產生了極大的共鳴。她也鼓勵我們建立一個年輕社會學家的全球網絡。

在「社會學的未來」圓桌論壇中，我們辯論社會學是否可以成為一種公共服務。「我們必須停止去分析那些我們早就知道的事務，停止發表那些沒什麼公共意涵的主題，而要專注

於社會的需求上。也有討論社會學專業化的場次，分享來自應用或學術的知識和經驗。我們也討論了這個學科專業的未來，以及共同和像是Catalan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Sociologists and Politologists這種組織合作的可能性。

這場會議集結了一群年輕的社會學者，他們共同追求科學的嚴謹以及具有社會意義的社會學。日後將會有網站，就像現在已經有的Facebook和Twitter一樣。最後，會議的晚宴是另外一個可以讓我們辯論、討論計畫、交友，和跳舞的好時機！

> 西班牙革命中的社會學

by Teresa Sordé,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和 Tatiana Santos, University of Girona



Catalunya Square, Barcelona – 「這個廣場已經被人民佔領了！」

華盛頓郵報稱我們在5月15日展開的運動為「西班牙革命」——一場影響力擴散到西班牙之外(最遠到日本)的運動。公民利用公共空間去辯論住屋、健保、教育等其他的社會議題，並且最後達成了共識。人們透過「對話式」(dialogic)的民主去闡述每一個特別的計畫。這是一場公民社會內部的討論，也是一場不同於既有政治制度的討論。之中一個最廣為流傳的理念，就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代表我們」(nobody represents us)。因此，5月15

日的運動以公民社會的自發自我集體組織為基礎，發展出了特殊的政治形式。因此，公共空間對所有不論來自什麼文化、年齡、教育程度的人開放，每個人也都有平等的發言權。

我們在Barcelona的Plaça Catalunya (Catalunya廣場)找到了符合這個需求的公共空間，提供給我們的運動一個最佳的集會場所。在那裡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的全體會議(General Assembly)，這是由運動的各個委員會所組織而成的

。參與這個運動的人可以選擇要加入那個委員會。每個委員會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並有人全天候協調會議的進行。若有歧見，那麼該議題就會進入下一輪的會議討論。若在全體會議中對某項議題有所歧見，那麼該議題就會回到原本的委員會。有不同意見者會被邀請去發表看法。此外，有一個特別小組會去規劃全體會議的議程。

這樣的「實質民主」透過了社會網絡而得以進展、傳播

>>



Catalunya Square, Barcelona - 一般會議

、擴張，特別是透過了Facebook、Twitter、部落格、網站，以及線上論壇等。在網頁上於24小時以前公布各委員會議的時程和全體會議的議題，線上論壇也會同步進行辯論。總之，由人民自己去決定什麼是重要的議題，例如，即使最高法院和憲法法庭不同意這個集會，但是人們仍然決定要在廣場上繼續下去。

有許多社會學家參與了這場運動。我們去的目的不在於告訴大眾什麼才是正確的、應該的，因為很顯然這種態度和立場和此運動的精神背道而馳。但是我們也不是只有去參加卻對辯論毫無貢獻。廣場上的公民非常希望我們把社會學的視野帶進討論

之中，所以我們發展出了一種對話的民主機制，也是在實踐公共社會學。

有些人持著一種反社會學式的「自發主義」觀點，認為沒有人預見這場運動的發生。我不同意，因為我們在4月12日去發動了一場我們稱之為由下而上的革命，以直接民主為訴求，在網路上號召大家。其中一位社會學家指出了經濟與政治問題的嚴重性，並且已在非洲北部發生的多起革命為例，說明來自各地、不同背景的人如何共享著相同的願景與夢想。他甚至訂出了集結的時間一月26日到5月31日之間。從那時開始，我們就馬不停蹄地去進行動員，散播我們的理念，想促成這場革命運動。

所以，社會學家積極地以自己的預測去行動，參加廣場的集會，充分應用其豐富的社會學知識。不過，並不只是我們的社會學對這場「西班牙革命」有所貢獻的，其對於豐富社會學的理论意涵也相當重要，因此我們也才能夠更進一步去理解此一對話式的民主運動。 ■

> 全球勞動——來自南非的觀點

by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South Africa, ISA前勞工運動RC主席

英國歷史學家E.H. Carr說過，一個人所看到的東西，會因為所處的角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而我站在非洲的最南端—Johannesburg，黃金之城。這是一個在全球化第一階段—在19世紀末的第一次大轉型時期—建立起來的城市。

本篇我將會闡述三件事情：(1)從南方觀點，提供如何去理解全球勞動的社會脈絡；(2)討論我自己對於工人的全球再結構之影響的論點；(3)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去理解在全球南方為何會出現反向全球化運動(counter movement)。

> 社會脈絡

工人團結的概念，例如，宣稱優勢者應該協助弱勢者，必須回到工業資本主義的開端。這是馬克思有名的標語：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

在南非，要求工人團結的呼聲以一個特別的形式出現：在1922年的大罷工事件中，白人工人以標語「全世界的工人為白人的南非團結起來」進行動員。

那些早期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從歐洲引進了工人世界主義，但卻無法說服白人工人，也就是他們的殖民者。而他們的命運是和黑人工人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被殖民者。白人工人以被黑人廉價勞動力取代的訴求，為自己的利益辯護。

這種工人階級的分化，是勞工團結的核心挑戰。世界上從來不存在同質的無產階級。今日和19世紀的情況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一份條件差的工作至少比沒有工作好。

但是有件事情值得一提，就是黑人工人長期以來成功地組織且參加了工會。他們的奮鬥歷程是一段長期、艱辛、努力和不肯讓步的雇主以及敵對且暴力的種族隔離國家對抗的歷史。

他們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跨國的團結連帶。那場對抗南非政府和實施財政許可的戰役相當重要，因為他們努力說服政府和以Nelson Mandela為首的非洲國家議會進行談判。跨國團結的例子，像是在San Francisco的碼頭工

人拒絕卸載南非船隻貨物，就是很好的證明。

1994年非洲國家議會的勝利，是一場不穩定的勝利。因為那個時期世界上的權力核心已經轉向資方。南非那時正在經歷一個雙重的轉型。一方面是民主轉型，勞工運動獲得了很大的權利；另一方面是經濟全球化，那時國際上都在削價競爭，向中國的低廉價格靠攏。

> 全球再結構化的影響

對勞動力而言，全球再結構化的過程始於民主轉型，讓勞動市場創造了越來越不安全的勞動力。這是在我們的Grounding Globalization書中所檢視的主題。我們以白人商品(像是冰箱、洗衣機等的生產)以及來自3個國家、3個工廠的案例，去說明全球化的競爭如何謂工人帶來的更不安全的條件。

- 在Electrolux Australia的例子中，我們發現了因為福利國家而裁員和退休的狀況。
- 在南韓，LG的工人以更賣命的工作去回應全球化的競爭。
- 在南非，工人回到家庭中，以便可以從事更多非正式的經濟活動，以求生存。

我們以Polanyi的概念來為這個雙重運動定位，並認為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是一場第二次的巨變。我們或許找到了保護社會不受去管制化之市場侵蝕的方式和動力，然而，這些對於全球化的回應仍是在地的。唯一一個以全球的方式去對抗全球再結構化的例子，就是在澳洲Orange的Electrolux工人。他們透過網際網路和在Greenville (美國Michigan的一個小鎮)的Electrolux工人，以及在瑞士總部的工人取得聯繫。但是這個建立工人團結的嘗試最終失敗了。瑞士總部的工會和管理階級的關係太過於緊密，以致於無法看到在中國設廠的優點。不過，對於下一步來說，這或許是「成功的一次失敗」。別忘記在Montgomery的罷車運動經驗。如同Aldon Morris所言，最後一次的成功運動，總是要歷經許多次的失敗才得以可能。

> 跨國團結的意義

要思考跨國團結連帶，首先要去區辨3種不同

>>

的團結類型。

第一種是我們稱之為「人道主義」(humanitarian)的類型。這是團結連帶主要是去支援那些遭受人權迫害的人，像是種族歧視、童工等。這類的團結連帶很大一部份是訴諸於道德。而就像反種族隔離運動的稱工一樣，這種類型的團結也相對地有力。這個類型可以採取消費者運動形式出現，或是對抗Rio Tinto爭取基本工人權益的運動那樣。這種運動若在網路時代去組織，是相對容易和成本較低的。

第二種跨國連帶的形式是「生產方式」(production approach)。這樣的團結連帶主要是工廠和工廠之間為基礎的形式。在澳洲的個案中，我們為發現這是最困難的組織方式，因為跨國的生產已經在國家之間造成了惡競爭的邏輯。若是GM的工人罷工，則其他公司會賣得比較好。儘管如此，國際間的團結連帶還是在成長中，例如Volkswagen的全球工人每年會集結去討論他們在德國、巴西、印度、南非等工廠的需求。航運業的工人是最早進入全球集體議價模式的一群人。來自世界各地運輸工人的檢查員在卸載車輛的時候從事檢查，如此一來他們可以，也是歷史頭一遭能夠爭取全球最低工資，並應用到全球各地的航運業上。

這樣跨國組織的新形式挑戰了20世紀常見的傳統以國家為基礎的工會組織。相較於以前的跨國連帶模式，新模式較難透過專門的跨國部門組織起來，也更可能在領導者和工會間建立。透過電子郵件和Skype穩定和直接的溝通，新的團結連帶形式更去中心化，更由下而上。

第三種團結形式我稱為「管制方式」(regulatory approach)。這個方式不試圖去集結世界各地的工人，而是去建立一種法律上的共同體—全球的權利和標準。最終目的是去規範管制市場，而不是取代市場。如同Peter Evans所說的，要讓市場成為社會的僕人，而不是主人。

一個可以在全球南方實施的新點子，叫做全球社會保障(global social floor)。例如健康保險、孩童津貼、或是最低收入的保障，不論是透過工作的現金的保證。這些是一種社會政策的當代創意，在巴西、印度、南非被實現了。

這些新政策孕育了反向全球化運動(counter movement)—一種由上而下的社會運動。國家透過NREGA去提供保障農戶每年100天的工作天。這讓每戶人家擁有了工作權，提供工作證給他們。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不過就是提供多一種選擇的改革，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是社會保

護系統逐步擴張的重要的第一步。

重點是全球化對於跨國組織者來說，並不只是限制，還是機會。全球化被以權利為基礎的論述而加速進程，也就是導致了由下而上的運動模式。在最近非洲北部諸國的例子可以得到印證。

但是，最有創意的的組織是以跨國網絡的方式呈現，例如在南非Durban的StreetNet International。它把零售商集結起來，對當地政府施加壓力，讓他們可以在公共場合販售商品。

我們並不是在全球化與在地之間做出抉擇，而是在兩者之間來回移動。這種結合方式，是Sidney Tarrow所謂的「在地的世界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s)。

藉著連結全球生產和全球價格，大企業變得越來越脆弱。在南韓生產的一個引擎零件，若是延遲運送，就會導致在澳洲的組裝進度落後，於是可以迫使兩國的資方上談判桌。這和30年代在Detroit的福特公司所面臨的狀況有些許類似。總之，新的運動力量和形式在全球化的年代裡浮現了。

如果我們現在把這個行動稱為反全球化霸權運動，還言之過早的話，我們就得好好重新思考一下我們這個研究計畫，重新思考全球資本主義、跨國金融體系之間的關係，以及全球勞工和社會運動的議題。這樣的新研究計畫必須要有多個層次的分析，才可以對反向全球化運動的建立有所貢獻。 ■



概念被廣泛用來形容中國在全球化生產上的能力。當資本家到中國設廠，他們要的不只是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他們還要勤奮、熟練、教育程度高的中國民工，因為這些工人願意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非常適合即時生產，並且同時是全球商品的潛在消費者。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因此也是新興工人階級誕生的基礎。

世界上的工人彼此相互競爭，比賽誰可以接受最少的工資和利潤，以及最差的勞動和居住條件。在這場競賽中，中國似乎是最底線。SA-COM (大學師生監督無良企業行動)——一個企圖連結學者和工人抗爭的跨國組織——在過去10年內已經記錄了許多跨國企業侵害中國勞工權益侵害的事件。積欠工資、強迫超時工作、可怕的健康與安全條件等現象處處可見。這個資本主義的市場某種程度是被後社會主義的政府所允許的，並利用對於自由結社的限制和罷工權的剝奪來達成此一目的。

> 全球勞動——來自中國的觀點

by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擴大再生產」迅速進展，造成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階級關係的快速重組。Edward Webster (在這期的全球對話)論及了新形式跨國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對於勞工運動的影響。關於這點，我有同樣的夢想，也非常願意以全球的觀點去脈絡化中國的地方抗爭事件。科技和資訊的進步開啓了資本的高速流動，並且跨國的新勞動力仍持續地動搖著既有的階級關係。然而西方學術傳統所謂的「告別無產階級」或是「階級分析的終結」，仍然沒有讓階級關係消失，反而階級和階級衝突的議題隨著資本一起進入的第三世界的社會裡面，使得中國成為相關

社會抗爭的前線。

> 中國的新興工人階級

過去30年來，改革開放和全球資本一起把中國轉變成一座世界工廠，並創造出數億人的工人階級。藉此和國際勞工運動結盟，雖然不樂觀，但是我們還是要抱持著不氣餒的精神去面對這場全球化惡夢。若中國現在是全球資本家所覬覦的對象，試圖尋找一種新的、毫無限制資本積累形式，我認為，這同時是新興工人階級的一場全球化惡夢。他們的反抗現在才要開始。

近幾年來，世界工廠這個

> 中國的境內移工運動

中國新興的工人階級正在經歷變遷與再結構化的過程。改革開放時代已經見證了階級分化、階級衝突、貧富差距擴大的發展。從屬階級因為缺乏發聲的管道，所以現在只好動員大眾抗議去表達其不滿以及對於壓迫的反抗。一項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在1999年和2005年間，全國性的抗議事件大約從10000件增加到87000件，每年增加幾乎20%。此外，參與抗爭的人數也從730000人到超過了3百萬人次。並且要

注意這之中有75%的抗議是由工人或農民所發起。除了次數之外，平均的大小、規模、組織程度也都有增加。

中國階級關係的進一步分化也可以見諸於現在許多的勞資衝突和日益蓬勃的勞工運動。集體抗議的形式，例如訴諸發放津貼的遊行，被欠薪的工人封鎖道路，集體法律行動等，都已經不是新鮮事了。無論在私營企業、外資、公營企業，抗爭日益白熱化，有時示威者甚至會攻擊政府的建築物，並和公安警察爆發流血衝突。證據顯示工人越來越積極地爭取自己的權利，並且他們會以各種方式(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直接或法律)進行動員。這意味著工人的集體行動不再只囿限於使用體制內或法律的方式去爭取自身的權益，而是透過罷工、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等方式，瞭解何謂「激進化」的過程。雖然有組織的階級實力之發展受到限制，但是工廠層級的罷工、停工、集體薪資議價、集體發聲等種種用來吸引媒體興趣、甚至攻擊國家機器等方式，已經是工人的常用手段，目的在表達不滿，要求變革。

> 面對勞工抗爭的挑戰

中國的工人階級抗爭，很明顯地受到結構性條件的限制。我曾經說過，新興工人階級已經經歷了一場無止境的(半)無產階級化，但是現在新生代則正在其所工作的工業化的城市中，經歷一場巨大的「精神封閉」(spiritual enclosure)。

勞工的世界史告訴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形成會把農村工人的第二、第三代(進城工

作)連根拔起。這樣的無產階級化，把農村勞動人口轉變成工業勞動力，並且剝奪前者的生產工具。事實上這也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史。結果不就是工人的命運取決於資本積累的進程以及勞動商品化的程度。這些工人不但無法擁有，也無法控制工具、原料，以及自己生產的商品。

當中國轉變成爲世界工廠以及現代的工業化社會的同時，也重現了許多在資本主義歷史中的常見景象。中國特殊之處在於其特別的無產階級化：爲了整合中國社會主義到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政府設立了戶口制度。這和南非的種族隔離類似，因爲它要求工人在城市裡面工作，卻不能合法住在城市裡。對於工人階級來說，工業化和都市化仍是兩股不相干的力量，因爲工人無法住在其工作所在的城市，也無法在其居住地工作。地方政府也從未想要幫忙解決工人在居住、教育、醫療等其他社會需求上的問題。移工是在法律上，而非現實上，被戶口制度禁止住在城市裡的一群人，並且階級的界線也使得他們只能拿到很少的工資，根本住不起都市。總之，這種無產階級化是在空間上，把生產侷限於都市，再生產限制在農村，以達到隔離的目的。這個制度造就了一種宿舍勞動體制，結合工作和「家」，和早期資本主義工作和居住的安排類似，但仍然持續把工人和城市隔離開來。

結果產生的是一種未完成無產階級化，這意味著是一種不完全的轉變—農民工(半個工人)。個體因遭受到不適當的對待，被迫要接受「流浪」。對於工人的第二代而言，都市和工業的大門仍然是關閉的，農民工無處可去

，無處可停留，就像工人所寫的詩：「你說，你終其一生，注定要漂泊流浪。」一旦走上這條不歸路，你既非農民、也非工人，什麼也不是。「永遠別後悔，即使你必須承受這一切巨大的苦難」—這是新生代打工仔(正在想辦法克服他們的不完整經歷)的座右銘。

> 結語

總而言之，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化創造了一批新興的工人階級，且他們正在嘗試各種型式的集體行動。第二代移工的「封閉」也促成了南中國的罷工潮。

我們已經發現了二代農民工的自我覺醒、憤怒、和集體行動，也注意到這些工人正好處在控制和支配的中心，使得他們必須協商和接合本身的行動。儘管存在著結構性障礙，工人階級每天以集體的形式反抗體制，威脅到了資本家，並讓國家下定決心要鎮壓他們。 ■

> 全球勞動一 來自墨西哥的觀點

by Enrique de la Garza,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Mexico City

Edward Webster提出了一個古典但切時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勞工運動的全球連結是否可能？而在這種連帶中，建立其他認同與團結的重要性又是什麼？

雖然Webster著重在「南方」，我認為他的分析超越了傳統的「發展—未發展」的二分架構，這不僅僅是因為已開發國家(如澳洲)也在南方出現，而更是因為北方的許多國家也有著南方的特徵。基本的議題仍然還是聚焦在如何克服工人之間的分化、由於族群、宗教、民族、甚至是職位(正式vs非正式，受薪vs非受薪，跨國企業的工人vs本地企業的工人，正職員工vs派遣員工)差異而帶來的分裂。因此在這個意義下，Webster的論點是正確的。全球的資本家競相削減成本，所帶來的壓力大到讓工人沒有辦法喘息，於是只好被迫接受權利和保障的喪失，以好繼續存活下去。這種生存策略也有可能導因自工人認同的分裂。

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這段歷史學到許多課題：

(1) 關於認同分化的理論，假設是由於職業的差異(Claus Offe)，或是勞動軌跡的分殊(Zygmunt Bauman)而導致，然而這種解釋終究過於表面，因為職業、公司、分公司、地域、國家、國際的差異始終存在著(第一國際的成員組成在職業上有很同質嗎？人民前線的組成有很同質嗎？)認同形塑、集體行動、社會運動的過程並非只是取決於行動者的職業位置。可以肯定的是，社會結構的確導致了集體的差異建構，但社會認同也來自於社會互動、社會運動、文化、被鑲嵌的主體性。

(2) 從工人的立場來看，跨國連結的物質意義早就存在於全球價格鍊中了，包括了現在的許多衝突，像是契約轉包或是海外設廠。雖然這樣的物質連帶並不保證帶來團結，不過還是有存在的例子。

(3) 有大量的工人處於全球價格鍊之外，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受薪或非受薪、傳統或現代的工人，皆是如此。我們必須去問全球勞工運動是否可以避免這種排他性認同的問題。

以拉美為例，其問題類似Webster的提問。無論在哪一個案例中我們都必須要指出非正式部門的重要性，因為其並不在勞動管制範圍內。按



加拿大的鋼鐵工人聲援墨西哥礦工

照國際勞動組織的新定義，拉美的非正式雇傭以及缺乏勞動保障的比例是總勞工數的40%到70%。非正式部門包括了大企業和小公司，但最常見的還是在總人數少於5人的公司裡面，而且這種小公司是拉美的多數常態。在這些部門裡面，部分的勞動力是受薪階級，但多數是家庭內的自雇者，並沒有領薪水。領取佣金的受雇者也算在內。因此，勞動管制就很重要了。工人在全球價格鍊中的位置也是一個關鍵的議題，並要探討正式員工和派遣員工之間的關係。

如同職業差異一樣，勞動立法和勞工組織的政策，在各國也有所不同。關於勞動立法，我們可以區分成兩組，其一是採取傳統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國家，例如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其二是那些採用替代性政策的國家，像是阿根廷、烏拉圭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巴西。工會力量和勞工權益的衰退，對於第一組來說是個重要的議題。至於第二組，工會和勞工保障有復甦的跡象。在90年代期間，當新自由主義幾乎席捲整個次大陸時，勞工的保障退步了不少。然而隨著新世紀的來臨，在許多地區情況卻進步了許多。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有些國家的勞動法允許非受薪階級組織工會，但是有些國家則不允許。

在工會政策的部分，其實有些地方和前述是類似的。雖然有些工會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並沒有提出什麼重要的反抗策略，但是還是有非常反對的例子存在。此外，有些工會非常堅

持對於勞動的狹義定義，認為是該是受薪的勞工，但仍然有些人採用較為寬鬆的定義。最重要的是，雖然才在初始階段，國際團結連帶是透過大型的全球聯盟、透過分部組織、透過針對特殊問題社運戰役，使用政府之間的協定(例如ILO)或是其它貿易協定，才得以建立。

換句話說，Webster所提出的那些已經存在的跨國連帶形式，如人道主義、生產方式、管制方式等，都相當重要。但是集體行動和認同的「液化」(liquification)所帶來的影響，並不需要以職業結構、勞動軌跡、或是至是 global 市場壓力的視角來看待，反而可以以工人烏托邦消逝的角度觀之。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是社會民主黨人士等同樣有著類似物質基礎、支持資本主義以外的選項的人，並沒有被取代，也沒有被淘汰。

最後，不同但可行的改革方案或許可在同一

個新自由主義系統中出現，就像Webster所說的3種連帶形式。這被限定在金融體系的管制上，或是一種全球層次的時代錯誤投射(例如世界社會論壇)。現在似乎還不是思考匯聚、將其轉換成全球計畫的時候，不論在知識上或是具體規劃上，皆是如此。 ■

> 埃及捎來的信： 論滾牛糞



1 牛糞抽樣

我之前的一位學生，現在正在南蘇丹的Juba工作，他寫信問我：「

我正在想要怎麼解釋什麼叫做滾雪球抽樣，因為這對沒看過雪球的非洲人來說簡直是場惡夢。

所以我就解釋滾雪球的過程，怎麼最後雪球會越滾越大，並且問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類似的經驗，就是球會越來越大，若有，那就可以為這種抽樣方法取一個非洲的名字。

一片沈寂之後，一位學生站起來說：那是我們滾牛糞的方式！

因此，滾雪球現在可以叫做『滾牛糞』了。」

我想，或許你會想與你ISA的同事們分享這個點子，特別是Michael Burawoy。

Regards,
Ray Jureidini
移民與難民研究中心，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

> 介紹Paulista編輯團隊

我們將在往後的每一期介紹一組《全球對話》的編輯團隊



由左至右：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Pedro Mancini, Renata Preturlan, Fábio Tsunoda, Dmitri Fernandes, Gustavo Taniguti.

能夠在此跟世界各地的讀者介紹《全球對話》的巴西編輯群，是我們莫大的榮幸。我們也很高興透過這份通訊跟大家交流社會學的資訊與經驗。希望這個對話的園地將會越來越蓬勃發展。以下簡短介紹我們的團隊—Paulista。

Andreza Tonasso Galli從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USP)的國際關係系畢業，現在是社會系的研究生，研究興趣是種族關係和黑人運動。她也參加大學的一個延伸計畫：「Educar Para o Mundo」，研究關於大眾教育、移民和人權。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拿到的第一個學位是社會科學(2004)，之後則是社會學的博士(2010)。2008年他拿到FAPESP獎學金，在法國巴黎的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從事社會學研究，發展他關於社會史的博士論文研究：1970年代森巴的象徵性再現和非裔巴西人文化政治的關係。

Fábio Silva Tsunoda有Universidade Estadual Paulista (UNESP/Marília)的社會科學學士學位，現在是USP的博士生。他從事巴西日本移民的研究，興趣包括了工作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移民。同時也是Plural這份社會科學期刊的編輯，並且也是Núcleo de Antropologia urba-

na' (NAU-USP)這個都市人類學研究團隊的研究員。

Juliana Tonche是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ão Carlos (USFCar)的社會科學學士，並且攻讀過碩士學位。現在則是USP的社會學博士生，專攻修復式正義的倡議運動。她的興趣包括了衝突管理和懲罰社會學。同時也是下列組織的成員：Núcleo de Antropologia do Direito (USP)、Grupo de Estudos da Violência e Administração de Conflitos (UFSCar)。

Pedro Felipe de Andrade Mancini是USP的社會科學學士，現在正在攻讀碩士學位，研究關於社會媒體，在虛擬世界中的社會交際。此外，他也是Plural這份USP研究生社會學刊物的編輯。

Renata Preturlan 是USP的社會學碩士生，研究關於São Paulo的玻利維亞移民。她是USP國際關係學士。也是都市人類學研究室移民小組的成員，參與延伸計畫：世界的教育。 ■

伊斯蘭遇上社會學 - Seyed Mohammad Saghafi 博士,神職人員,在Azad University 教書; Gholamabas Tavasoli 博士, 伊朗的首席社會學家



論了19、20世紀伊朗和土耳其的思想家，並建議可以汲取這些思想家的思想去建立中東社會學。此外，正如Biuk Mohammadi所指出的，中東社會學的源頭不該被狹義的定義在社會思想，還要延伸到文學領域。這樣一來，中東社會學就不是忽視西方思想，而是更有創意地吸收其精髓；Özervarli則以19世紀土耳其思想家為例，說明他們如何做到了這件事情。

另一個核心議題是伊斯蘭教與社會學的關係。Riaz Hassan以其豐富的教學研究經驗說明什麼是伊斯蘭教社會學(sociology of Islam)。當然這也不可避免的會有神學和社會學取徑上的矛盾問題，特別是當我們要解釋伊斯蘭教的起源時。Riaz Hassan則發表了一篇詳細討論此一主題的論文，並且和伊斯蘭社會學(Islamic Sociology)保持一定的距離；不過同時也有許多其他神職人員進一步闡述伊斯蘭社會學的觀點，並且對西方的社會學站在比較敵視的立場。

與會人士都熱切希望這個會議可以每年或是兩年舉辦一次。而現在也正在規劃下一次關於中東社會思想的會議，將會在Istanbul召開，可能的時間是2011年。然而，為了符合此一會議之批判精神，也有人建議揚棄掉「中東」這個概念，因為用這樣一個帶貶低意味的字眼一如同荷蘭殖民經濟與社會史學J. C. Van Leur所說的一種來自於「船上的甲板、城堡的堡壘、貿易中心的畫廊」的優越態度與觀點一來稱呼這個地區，實在不能令人滿意。 ■

> 動社會學在中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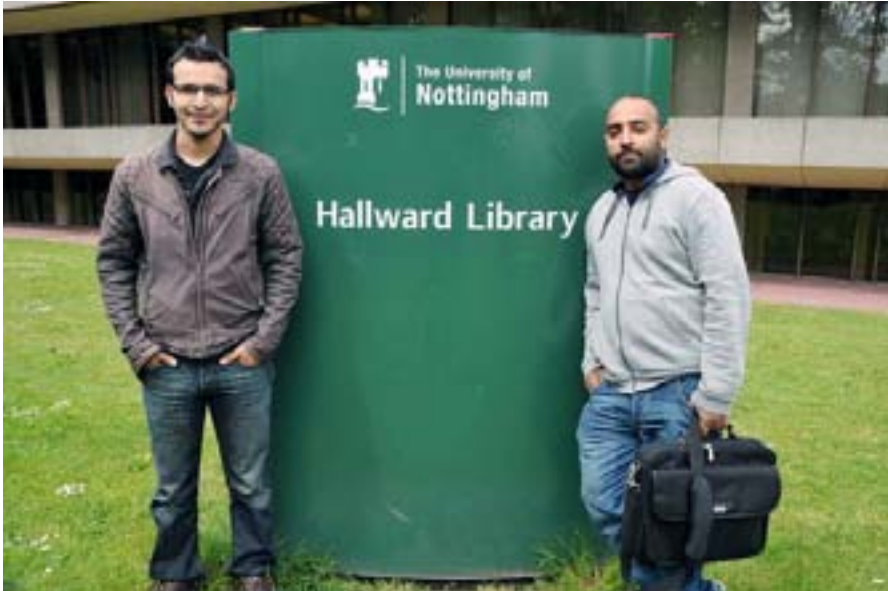
by Syed Farid Alatas，國立新加坡大學社會學系

今年的5月28日和29日Tehran舉行了一場名為「當代中東的社會學與社會思想」的會議。這可能會成為這個地區的社會學例行系列會議。此次聚集了來自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的社會學者參與，並且由伊朗社會學會和ISA主辦，且由Istanbul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Culture、伊朗的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Mashhad的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Thought、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and Collaboration、Jamee-Shenasan Publications的Social Sciences Faculty Branch等單位共同籌辦。大約總共有50多篇論文發表，半數是用波斯文。

會議由Michael Burawoy和伊朗首席社會學家Gholamabas Tavasoli的演講揭開序幕。Burawoy教授認為這場會議非常重要，因為事關中東的區域社會學的建立。區域社會學不僅僅要理解國家內部的社會過程，還有跨國間的議題。他認為中東地區是一個可以嘗試建立全球社會學的重要場域，理解地區將可以為社會學的

普遍化貢獻到什麼程度。Tavasoli與Burawoy的立場一致，並特別關注其他非主流的社會思想觀點，例如，他認為社會學裡面的某些概念，像是公民社會，其實發源於伊斯蘭時期(pre-Islamic)或是伊朗，而非希臘。

在中東的社會學討論總是非常具有批判性，並且強調中東地區要找到不同於西方傳統的選項。在這場會議中也不例外。Tina Uys、Sari Hanafi、Michael Kuhn、Ebrahim Towfigh等人的論文也討論到了這些中東社會學所面臨的問題，例如東方主義或是學術依賴性。然而與會者也直接指出，重點不應該擺在老是猛烈抨擊西方，而是要做出好的社會學研究。這意味著我們要超越西方視野的侷限，整合中東自身的觀點，並帶進其他地方的概念。的確，我們總是有聽到對於本土社會學或是非主流社會學的要求聲音。這場會議的新穎之處就在於不但回應了這些要求，也說明了中東如何對於社會思想有所貢獻。Sait Özervarli、Mohamad Tavakol、Seyyed Javad Miri則討



> 戕害學術自由： Nottingham的案列 與告密者

by Alf Gunvald Nilsen, University of Bergen, Norway

在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oN)最近發生的一起事件，讓我們發現，學術自由——一種作研究、在公共領域發表結果的自由，免於受到懲罰、開除、或是侵犯公民權的恐懼——非常可能已經成為所謂「反恐戰爭」的犧牲品。

Rod Thornton博士出身英國士兵，是一位國際恐怖主義和反暴動的專家，他在今年5月4日被迫解除他在UoN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SPIR)的講師職務。原因是由於Thornton博士發表了一篇論文，宣稱UoN的組織高層必須對錯誤逮捕兩位無辜的穆斯林——Rizwaan Sabir (SPIR的碩士生)和Hicham Yezza (現代語言學院的職員以及Ceasefire這份政治期刊的編輯，他們在2008年5月被懷疑是恐怖份子)——負起責任。

他們兩位被逮捕後拘留了6天，最後被無罪釋放。整起事件肇因於Yezaa的一位同事發現他的電腦桌面上有一份名為「蓋達組織訓練手冊」以及另外兩篇學術論文。Sabir原本下載這些文件的用途是為寫他的碩士論文，主題是關於激進伊斯蘭。然後他把文件寄給了他的朋友Yezaa，詢問他的意見。最重要的是Sabir是從美國司法部的網站找到到那份手冊的。

而Thornton博士在論文中並不是在分析那些文件被找到後的風險(按照政府的方針，這是UoN的任務之一)，而是詳細的說明校方的管理階層如何與警方聯繫，然後接著那兩個人就被逮捕了。還不只如此，Thornton博士還說，在他們被釋放後，校方還很努力地污衊他們及其支持者，

好讓那些質疑和挑戰UoN的聲明——文件是非法的以及逮捕是合法的一的聲音可以消失。

UoN為Thornton博士的言論貼上了一個「毫無根據」的標籤，並且說他詆毀他的同事。然而校方自己卻從未拿出證據來。換句話說，Thornton博士的解除職務一案，是為造成寒蟬效應。

Thornton的論文是一個細緻的研究報告，其論證背後有紮實的資料為基礎。他在超過112頁的論文中提供了該校內部的言論記錄，並且受到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保護，進行了3年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Thornton用盡了所有內部管道去表達他對UoN的不滿。

可以肯定的是Thornton博士的報告、對校方的批判以及其行為，並不足以作為侵犯學術自由的正當理由。若以公平而論，他應該馬上恢復職位，並且UoN必須把那些對於Thornton博士的宣稱交付公共審查。

請加入Noam Chomsky以及其他人士，到S.W.A.N. 簽名，支持其訴求(<http://www.thepetitionsite.com/1/support-whistleblower-at-nottingham/>)。 ■